

張火山先生訪問紀錄

受訪時間：2014年8月18日，

10:00-14:00

受訪地點：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訪談人：李福鐘

紀錄：游淑如



受難人資料

受難人/案件/判決書年齡	職業/經歷	刑 期	與受訪者關係
張火山 臺灣省工委臺南市工委會 鄭海樹等人案 24	學生	有期徒刑5年 褫奪公權2年	當事人
案情概況	張火山先生， ¹ 1928年生，高雄市人。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記載，張火山於就讀臺南工學院期間，加入由鄭海樹擔任書記的中共臺南市工作委員會臺南工學院支部。		

家庭與就學

我於1928年出生於高雄市苓雅寮，即今日高雄市苓雅區，但我還是習慣稱苓雅寮，聽起來比較「草地」。事實上，高雄市的發展是從苓雅寮和旗后²開始的，

¹ 目前蒐集到張火山先生的相關資料，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40）安潔字第1187號判決書。張火山先生過去並未接受過口訪談。

² 旗后，今高雄市旗津區。

那是當時高雄最熱鬧的地方。據說以前連鳳山郡的郡守上任後，都必須坐轎子來到苓雅寮，拜見苓雅寮的員外。日本時代的苓雅寮港墘附近，建有許多石油公司的儲油槽，雖然儲油槽今日很常見，但以前非常稀少，特別是為防範戰時空襲，在儲油槽四周，搭建很高的水泥防護牆。

我家有九個兄弟姊妹，上頭有兩個姊姊、三個哥哥，我排行四男，下面還有弟弟、妹妹。我父親是電力公司的職員，愛河東邊這一帶的電力，皆由我父親負責管轄。當時一顆「電球仔」壞掉，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更換，必須跑來找我父親，說：「電火壞掉」，拜託我父親幫忙更換。如果想購買電球仔，也必須到我父親這裡來買，普通一般商店並沒有販賣。其次，因為我家對面剛好是日本警察的宿舍，再加上我家有「埕」，³家裡有「外燈」，當時只有我家門前掛有「外燈」，很明亮，所以一些鄰近的小孩常來我家玩，因此講日本話的機會自然比較多，我還曾經代表全校參加日語比賽。回想當時，是自然而然就會讀書，不是特別努力用功。話雖這麼說，我們當時確實是想當很優秀的日本人，想證明我的「國語」也能說得和日本小孩一樣好。

讀書的時候，當然讀的是日語。那時候小學教育分成「公學校」和「小學」，高雄市有三到四間公學校，有兩間小學，日本人讀小學，臺灣人讀公學校，使用的教科書當然也不一樣。⁴有志進學的臺灣囡仔，像我自己，大哥還會去買日本小學的參考書來給我看，這樣和日本仔競爭的時候才有可能會贏。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比日本小學生有更好的學力，才能夠考取中學。

當時的高雄中學，一般來說，從公學校六年級應屆考上的人，全市頂多一、兩個人，不然就是等公學校畢業之後，再讀高等科一年或兩年才能考上，多讀一、兩年而考取的人約有十幾個，其他的學生都是日本人。當時高雄中學一年僅招收 150 到 200 人。像大我二歲的哥哥，他讀公學校的時候，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當級長，六年級時候應屆就考上。他那一屆，應屆考上高雄中學的臺灣學生才兩個，另一位是另一所學校的級長。我這個哥哥後來去菲律賓，沒有回來。我的姐姐也是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當級長，考上高雄女中，當時也是一屆只有一、兩個臺灣人考上。我們兄弟姊妹都算優秀吧，在這種鄉下地方，

³ 庭院、廣場、曬物場。

⁴ 1930 年代中期，當時高雄市的公學校包括高雄州第一、第二、第三公學校，第四公學校則在受訪者就學期間前後成立。小學校則為高雄州高雄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高雄州高雄第二尋常高等小學校。

整個家族都接受高等教育，這並不簡單。坦白說，以前我們都是穿木屐去學校，後來才開始穿布鞋。等到我唸五年級、我哥哥唸六年級的時候，爸爸帶我們去菜市場買一種專門穿來踢足球的皮鞋，鞋子前面有一塊比較厚的皮，踢不破，穿起來很威風呀。那時候經常打赤腳，捨不得穿鞋子，直到校門口才穿上鞋子。這是有影的事情。

說起來我們仍然心存感謝，日本時代臺灣可以這麼發達，主要是教育的因素，國語的普遍、文盲的掃除，當時教育普及率約 75%至 80%，警察也會到處勸導小孩子要上課、上學。有些人家沒有辦法讓小孩子上學，因為必須種田，學校老師又會跑來勸導，非常熱心，目的就是想让這些小孩子可以就學。因此，學校教育很普及，所謂「國語」，也就是日本語的推行，很徹底。現在很多人說「皇民化」，皇民化其實是比較後期的事情，我們那時候完全沒有皇民化這種說法，只是覺得我們就生在日本國，既然我們說不一樣的臺灣話，那麼就要趕緊學講日本話當日本人，如此而已。如果我們這一個世代的人，都不再提起這些事，以後就不會有人說實話了。我只是想表達，我們都想當很好的日本人，而且我們也表現得還不錯。

等到中日八年抗戰，大概是我讀小學的時候，才稍微有所謂皇民化的推廣。為什麼要皇民化，因為要徵召臺灣人當軍伕。軍伕有軍伕的歌，把臺灣的《雨夜花》，改編成《榮譽的軍伕》：「赤い襷に，譽の軍夫，嬉しい僕等は，日本の男……」⁵這種狀況如果被當時的外省人看到，一定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上戰場打仗，還要幫你鼓掌、放鞭炮，揮舞著旗幟歡送你入營？這其實是一種榮譽感，要出征、為國家打拼，臺灣人當時抱著這種榮譽感。後來大陸的兵來到臺灣，支那兵真的令人失望。

雖然那時候，我們也常常覺得被日本人欺負，讀書時候日本小孩經常毆打臺灣小孩，臺灣小孩也不畏懼，和日本小孩打架，看到日本人就叫他們日本狗。我們讀的是日本書，叫中國 CHINA——支那，這種叫法對中國來說有一點侮辱的意思，但事實上是「Chin」的轉音，就是「秦國」的意思。日本人對秦國很崇拜，因此稱中國為「支那」並沒有侮辱的意思。但是中國人會覺得自己稱作清國，再不然就是民國、中國、中華民國，為何日本人一定要稱作「支

⁵ 日文歌名《譽れの軍夫》，這段歌詞的意思是：「紅色的彩帶，榮譽的軍伕，多麼高興的我們，是日本的男兒。」

那」？日本兵去大陸的時候，也都叫他們「支那兵」，因此「支那」就變得有侮辱中國的感覺。但是對日本人來說，其實沒有這個意思，反而是一種很普通的國稱罷了。應該弄清楚「支那」是從「秦」、chin 音轉而來。

由於父親就職電力公司，哥哥開電氣行，從小自己一直想要做電氣技師，所以都沒有去投考中學校，而只報考工業學校。我考進高雄工業學校，戰後改名叫「高雄工業職業學校」，⁶我是第一屆畢業生。此外，我是高雄工業學校同窓會的創會會長，同窓會的會刊曾經登過我的自傳。高雄工業學校畢業後，我考上臺灣省立工學院，原本稱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也就是現在的成功大學。⁷由於我當時是以高雄工業學校四年級生的身分考的，學齡相當於高中一年級，因此必須先進入臺南工學院的先修班就讀一年，之後才正式進入工學院一年級。而我的中學同學都是唸到高三才來考大學，比我晚了一年，所以我比同齡的同學賺了一年。我這一屆大學畢業的時候，1951年，還沒有預備軍官制度，隔年1952年才開始實施，因此我的老同學們後來都服了預官役。有時候有人問我是哪一屆畢業？我常說我是不用服預官役的那一屆。

空襲

唸高雄工業學校二年級的時候，因為戰爭關係，日本政府已經開始動員學校學生參加所謂的「奉仕作業」，拿著鋤頭把蕃薯田整平，蓋機場，也就是今天的高雄小港機場前身。當時全高雄市的中學生都被叫到那裡掘土，我們看著螺旋槳飛機飛下來又飛上去，大家很熱烈地鼓起掌來。所以從二年級開始，就沒有正式讀什麼書。等到我四年級時候，碰上美軍轟炸，大家都「疏開」，⁸學校也停課。但是我父親說：「男孩子不用『疏開』」，所以我父親、我哥哥、和我都留在家裡。當時日本政府要求挨家挨戶要建造防空洞，許多人家用磚頭、草木蓋防空洞，那樣根本經不起轟炸。我父親很聰明，他去買了建造地下排水管用的大型水泥管，用那個建造我家的防空洞，非常堅固，人蹲在裡頭剛剛好。

⁶ 1942年創立，校名為「高雄州立高雄工業學校」，1946年改名為「臺灣省立高雄工業職業學校」。

⁷ 1931年創校，正式名稱為「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1940年改為「臺南工業專門學校」。戰後，1946年先改為「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隨即又改為「臺灣省立工學院」，1956年8月改制為臺灣省立成功大學。

⁸ 「疏開」為日文漢字，指戰時為避免空襲造成傷亡，將城市居民往鄉間疏散。

我家所在的苓雅寮，附近有很多大型儲油槽。那時候全高雄都是軍事基地，海軍和空軍都必須依賴這些儲油槽，美軍轟炸機當然把苓仔寮的儲油槽當成首要目標。一開始遇到空襲的時候，聽到防空警報，大家都趕快躲到防空洞。但是幾次之後，我們懂得先觀察飛機飛往哪個方向，然後躲在「亭仔腳」⁹看飛機「放糞」。有一次，看著看著，發現飛機竟然朝自家方向飛來，結果我家用竹子編的防空洞門，被炸得噼哩叭啦響，等到轟炸結束，出來一看，家裡廚房不見了。

後來慢慢習慣轟炸的生活。有一天晚上，飛機又來襲，我們鋪著草蓆、躺在亭仔腳，正在納悶飛機的聲音為什麼比平常大聲。平常空襲時候，海軍軍艦、山上、陸地三個方面的探照燈都會打開照射。那天很奇怪，都沒有探照燈，結果突然間好大一架轟炸機出現在我們頭頂，這時所有探照燈都一起照了過來，美軍轟炸機瞬間被擊中，空中分解。原來那架美國轟炸機想飛低一點，躲開探照燈的搜索，最後被港口的軍艦打了下來。

我們也看過戰鬥機在空中交戰，結果飛機掉下來，大家很高興鼓掌，沒想到是日本的飛機。如果是美國的飛機掉一架下來，大家就趕忙跑去看美國人。二次大戰駕駛飛機的日本軍人，為了防寒都穿著厚厚的飛行裝，戴著飛行帽。但是美國空軍卻穿著短袖短褲，差不多就是十八、九歲的年輕人。這意味著飛機的技術不一樣，對人的考慮態度不一樣，裝備也就不一樣。日本人開砲的時候滿身大汗，美國人開砲的時候，一邊喝著可口可樂一邊開砲，很輕鬆。

聽說當年美軍轟炸臺灣的計劃圖，是由一個曾經住過臺灣的美國人擬定的，他曾經擔任臺南工學院的老師，返回美國之後成為美軍對臺情報的重要策畫人。葛超智（George Kerr）《被出賣的臺灣》一書中就提過這件事。因為他曾經是成大的老師，所以美軍大轟炸時成功大學校園一點沒有創傷。當時成大旁邊就是日軍第四部隊，稱作「南部隊」，是南臺灣最大的陸軍基地，按理說成功大學應該躲不過轟炸才對。據說日軍攻打南京的時候，「一番乘」¹⁰就是這支兇猛的部隊。

三哥

⁹ 臺語，騎樓。

¹⁰ 日語，唸作「いちばんのり」，指率先攻進城池的人。

我三哥在二次大戰末期志願當海員，去了菲律賓，再也沒回來。他在公學校畢業後，是應屆考上高雄中學的兩個臺灣人之一。因為應屆考上，而其他同學大多是多讀了一兩年的高等科，所以我三哥年紀比其他同學小，被欺負得很慘。學校教國文的老師對我三哥說：「不要自暴自棄，如果畢業之後想謀求發展，應該去大陸或滿州，不要去日本。」據說那位日本老師曾經是日本特務情報員，待過大陸。結果我三哥十八歲時志願當海員，他想利用機會到海外見識。當時他的年紀可以當少年兵，但他不想當兵，立志要當海員。

三哥一當上海員，馬上就是三級事務長，穿起海員衣服，很威風。當時的中學學歷，可以抵得上現在的大學學歷。三哥腦袋又聰明，如果不是戰爭，他應該可以上大學。可是沒有辦法，當時已經發生戰爭，我三哥不願被徵召去當兵，所以志願去當海員。他先隨船去日本，再回到臺灣，然後再去菲律賓。這期間他跟家裡一直有聯絡。最後我們收到他的電報，說要去新加坡，然後就沒消息了，戰爭結束都沒回來。他的船大概被擊沈了。他的船據說是運輸船，運載軍用品或士兵。

學徒兵

戰爭後期，學校通知，要大家來當兵，大家也沒想到偷跑，乖乖地自動集合到學校。我們還在學校唸書的學生就這樣成為學徒兵。當時我在高雄工業學校唸四年級，等於是高一的年紀。我們的任務是分派建造兵舍，因為建地就在高雄工業學校，所以實際上我們就是待在自己學校，老師們因為曾當過兵回來，所以有些老師當起小隊長，而學校的軍訓老師因為是現役軍人預備少尉，因此擔任中隊長。學生自己來到學校報到，向老師說：「我來了。」家裡也說：「應該去喔！」沒有叫我們逃跑。

當學徒兵很可憐，伙食很差。給我們吃的米都是紅色的，因為是屯積的舊米，已經快發酵了，帶點酒味。飯盒滿滿的飯，但沒有菜，只有空心菜湯，上面漂著幾根空心菜梗。空心菜湯如果煮太久，會變苦，我們都叫它「漢藥湯」。直到今天我還是很不喜歡吃空心菜。當時偶而加菜，大家高興鼓掌，其實也只不過是飯裡添加五、六顆綠豆。當時為了備戰，把新米都囤積起來，只拿倉庫內三年前的戰備米來吃。

學徒兵時期，除了建造兵舍之外，也接受作戰訓練，還好美軍沒登陸臺灣，如果美軍真的登陸臺灣的話，我今天可能不會在這裡了。我們當時接受訓練把竹竿綁上炸藥，一旦美軍登陸，我們就抓著竹竿往前衝，用炸藥炸死敵人。我們甚至被訓練在炸彈爆炸的時候，必須趕快趴下，以免自己也被炸死。這真的是臺灣話常說的：「不知死活」。十七、八歲的小孩，血氣方剛，有人慫恿，真的會拼命。日本的神風特攻隊大概也都是一些十八歲的年輕人，不知死活。

我現在回想起那時候的心理狀況，如果美軍真的上岸，我真的會拿竹竿去衝鋒。不但如此，我們還挖洞，所謂的「章魚洞」，人躲在洞裡，洞口拿草蓋住，不能著急，等到戰車來到頭頂上方，戰車車底是最薄、最脆弱的地方，此時用炸彈炸破戰車車底，而且炸彈爆炸前自己必須趕快趴下。我那時候還傻傻地想，如果美軍戰車真的來了，我為了國家，真的會去炸戰車。如果是日本人，會說是為了天皇，但臺灣人比較沒有天皇的概念，而是覺得臺灣和日本命運是一起的。不過，美軍也很聰明，不敢從臺灣上岸，改從琉球上岸。駐守琉球的日軍才多少，美軍傷亡人數已經那麼慘重，作戰時間拖得比預計要久。當時日本最強的滿州軍，也就是關東軍，本來打算從滿州派往菲律賓支援，因為臺灣海峽被美軍封鎖，只好留在臺灣，所以當時臺灣兵力十分強大，據說有十幾萬精兵。¹¹如果美軍在臺灣登陸，大概要打上好久好久吧。幸好，美軍沒有登陸臺灣。

戰後接收

雖然日本時代我們在心理上很想當一個優秀的日本人，但終究跟真正的日本人還是有差別。尤其跟日本小孩吵架的時候，他們會用「清國奴」(チャンコ)罵我們，當然，我們就用「馬鹿野郎」(ばかやろう)罵回去。所以戰爭結束的時候，臺灣人內心開始覺得要回歸「祖國」了，那是真心的感受，有所歸屬。

¹¹ 日本宣布投降時，日本軍隊在臺灣的總數有 222,400 人，陸軍有 165,219 人，海軍有 57,181 人。軍隊中，臺灣人（多為軍屬）有 2,260 名，日本人有 217,740 名，韓國人有 900 名，沖繩人有 1,500 名。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委員會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書》（臺北市：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委員會，1946 年 6 月），上冊，頁 27、48。劉鳳翰，〈抗戰勝利前後日本侵華軍隊的分析與研究：1945 年 7 月-10 月〉，收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下冊，頁 801-802、836-837。

在日本統治時期，臺灣人地位其實比朝鮮人高。從臺灣人的角度來看，琉球人無疑是日本人，但是日本國內並不認為琉球是日本人，琉球人只是二等公民。那如果是臺灣人的話，大概是二等半。至於朝鮮人，大概是三等或四等。朝鮮人到日本，只能作一些挑糞的工作。相較之下，臺灣小孩到日本不是讀醫學院，就是很有錢，因此日本人只要聽說姓林或姓陳的臺灣人，就以為他們是有錢人，因為林本源家和陳中和的家族都當過日本議會議員，¹²所以日本人會覺得姓林、姓陳的都是有錢人。所以說，當時臺灣人到日本，地位也許不只二等半，大概算得上二等。雖然如此，光復的時候我們還是覺得回歸祖國了。

戰爭結束後，各校學生便自發組織起學生聯盟來，這並不是由學校發起，而是學生自主組成的。當時覺得既然已經回歸祖國，日本人要回去了，為了維護秩序，所以自動自發成立組織。

學生聯盟為了歡迎回歸中國，歡迎中國軍隊，聽說軍艦要從苓雅寮的後方上岸，我們就列隊在高雄市成功路上，等著歡迎國軍。結果等著等著，奇怪怎麼沒看到軍隊抵達。倒是有一群人用扁擔挑著鍋碗瓢盆，背後揹著斗笠，還有人揹著飯桶、飯鍋。我們看慣了日本軍人，綁腿打得結結實實，軍服筆挺，一下子看到中國軍隊的樣子，全都傻了。於是有人想辦法解釋，這種裝扮應該是故意的，因為打游擊戰，必須打扮成這個樣子。中國軍人腳上也有綁腿，但鬆鬆垮垮的，在腳下裹成一團。於是又有人解釋，可能是中國軍隊腳上綁鉛塊，平常訓練腳力，打仗的時候把鉛塊丟掉，能夠跑得飛快。我們當時根本不了解中國軍隊的情形。我們的綁腿帶不僅要綁得很整齊，上面還要有折痕，如果當時日本兵綁腿綁成這樣，早就被打巴掌了。我們當時看到中國軍隊的心情，就是這樣，覺得他們像乞丐，草地中的草地人。而且中國軍隊每個人油首垢面，沒有日本軍人抬頭挺胸、雄壯威風的氣勢。我們不相信這就是中國軍隊，一直等一直等，想說軍隊怎麼一直都不出現，最後才知道我們看到的就是國軍。

即使這樣子的軍隊，我們也是很熱烈歡迎，還列隊唱歌，所以說那時候臺灣人是真的歡迎回歸祖國。如果說這是陳儀的錯，還不如說是蔣介石的錯，如果蔣介石不要派陳儀來臺灣，不要派這種軍隊，而是派其他人，比如白崇禧的軍隊，或是青年軍，結果會不會不一樣？這些來接收的軍隊沒受過什麼教育，只想著是打勝仗而贏來的地方，到處亂來。我大哥當時開電器行賣電燈泡，一顆賣五塊錢，

¹² 林本源家的林熊徵擔任過臺北州協議會議員；陳中和則擔任過高雄州協議會議員。

阿兵哥來買燈泡，要開收據，他說：「你寫十塊啦！」我大哥說：「為什麼寫十塊？」他說：「沒關係啦，你就寫十塊。」那時候，因為畏懼對方是軍人，他要求開十塊錢收據，就開給他。沒想到，隔天這個軍人又來到店裡，說：「電燈泡不能用，還給你們，要退錢。」退他五塊錢，他說：「十塊錢，你自己寫十塊錢的」。這是發生在我大哥身上的真實事情。我大哥當時是電器工會的理事長，他開了很大一間電器行。

我們真心歡迎祖國回來，但是情況越來越奇怪。我們本來很尊敬蔣介石，覺得他是英雄好漢，是中國的救星。我們也聽說宋美齡長得很漂亮，後來看她是四角臉，雖然氣質還是很好。我也曾經去北京的宋慶齡紀念館，她們家姊妹的臉，都是四角型。我們以前想像宋美齡就是「宋美人」，而蔣介石是大英雄。但不到一年時間，我們便開始懷疑了。那時候還沒發生二二八事件，從我大哥的店發生的買燈泡事件，就可以看出臺灣人會對現況茁生不滿。

二二八事件

因為我讀電機，有一天早上試裝收音機，我的收音機只有一顆真空管，一般只能收到高雄放送局的廣播，必須要狀況很好才收得到臺北的廣播，結果那天竟然聽到，而且播放的竟然是日本海軍的「軍艦行進曲」，我嚇了一跳，以為我的一球收音機收到日本的短波廣播，多麼地成功呀！結果再往下聽，便聽到：「臺灣的同胞注意，我們已經作主了，我們現在佔領臺北放送局，昨天……。」這大概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一天的事情。¹³聽到廣播之後，我跑到學校，發現大家已經在講堂集合。我們打算組織學徒軍，但又怕使用「軍」這個字，便改稱為「保安隊」。我們認為學生的任務，應該是保護臺南，不要讓臺南陷入混亂。後來，有些人跑去攻擊憲兵隊，有些人跑去攻擊警察局，我跑到臺南的警察局，看見湯德章，他是非常有名、很有人望的律師。他看著當時的狀況這麼混亂，連「竹雞仔」¹⁴都上街鬧事，他提醒大家：「如果這些人縱火該怎麼辦？」我當時不曉得為什麼剛好站在湯德章旁邊，聽到他憂心跟大家講這些話。可見，湯德章當時考慮的是保護臺南地方的安全。結果後來的下場，卻是在大正公園¹⁵被槍斃示眾。從

¹³ 位於臺北市新公園的臺灣廣播電臺被占領，是在 1947 年 2 月 28 日當天下午。

¹⁴ 竹雞仔，南臺灣俗語，用來稱呼小混混、小流氓。

¹⁵ 舊臺南州廳（臺南市政府）前的圓環廣場，1916 年命名為「大正公園」，1945 年之後改稱

那時候起，我漸漸認為蔣介石這個人真的不好。

後來，不記得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第幾天，學生隊決定自行解散，說已經沒事了，叫大家回家。當時因為火車停駛，我就從臺南走路，一路走回高雄。又再經過兩個禮拜之後，學校通知大家回來上課。回到學校之後，沒幾天我就被抓走了。¹⁶我不知道自己為何被抓，大概是有人密報吧。那時候密報有功勞，可以升官，連混混都可以因此當官，至少也可以當個刑事之類。現在想起來很奇怪，被四名憲兵帶槍圍著，我還一點不懼怕，請他們等我換好衣服。站在軍用卡車上也挺胸立正，迎面風吹覺得「有難我赴也」之慨。

因為二二八事件中我曾經被關，後來我發表過一些文章在二二八紀念館的刊物上，二二八紀念館也有我的照片。我不知道政府那邊是怎麼打聽到我的，我被抓的時候，心情上其實並不恐懼，一方面是因為我那時候才十八、九歲，大學一年級，年紀還小不懂得害怕，另一方面我真的覺得沒做什麼壞事，二二八期間我做的都是好事，因此並不害怕。被抓的當天，我和我的同學，還有他的小孩，正在吃早飯，當時我和一位成大的同學，一起寄宿在這位同學家裡。和我一同住宿的這位同學，後來在白色恐怖中被槍斃了。當憲兵闖進來時，站在我背後，大聲喊：「哪一個人是張火山？」我回答：「是我。」他就說：「好，我們走。」我後來聽我那位同學說，我當時都沒有害怕的樣子，表現得很鎮定，我還跟對方說：「你等一下，我換衣服。」然後，我進到自己的房間，阿兵哥跟著我進來，我換好衣服，穿上夾克，跟著他出去，坐上卡車。阿兵哥看到有兩具竹製劍道鎧，說是兵器，一起帶走。四周都由憲兵團圍住，只有我一個人站在卡車上的前面中間，開往憲兵隊。我那時候心裡想：「這次去，大概不會回來了」，因此以最後一眼的心情，看著周遭的路，我當時住在開山派出所的對面，就在開山路和府前路的轉角。

被抓之後，我和一些流氓、乞丐，還有一兩個學生，被關在臺南監獄。那時候覺得：「這回一定死定了」，但是那時人傻傻的，也不會害怕，心想即使把我打死，我也是為了臺南好，我也沒有打死人，頂多就是為了臺南的保安，參加保安隊而已，所以很鎮定。大概被關了三、四十天，監獄整個房間很可怕，

「民生綠園」。因二二八事件過程中湯德章於此遇難，1997年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

¹⁶ 根據〈高雄要塞兼臺灣南部防衛司令部臺南區指揮部逮捕擾亂治安及防害秩序罪人犯一覽表〉記載，其案由為「非法搜索他人住宅」，3月由憲兵隊逮捕。收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6月），頁24。

裡面關的大多是一些有刺青的人，讀書人大概只有一兩個。

關在我隔壁房間，有一個樸仔腳¹⁷的保正，姓馬，他是我學長的父親，所以我比較記得他的事情。我每天都會聽到他喊：「報告」，他喊報告的原因是想出去上廁所，因為他是保正，比較被禮遇。過了一陣子，想著怎麼這幾天都沒聽見他喊「報告」的聲音，我問裡面的人：「馬伯伯怎麼了？」才知道他已經被槍斃。

後來，聽說白崇禧來了，根據監獄雜役的風聲，白崇禧比較有知識的樣子，比較能瞭解學生的想法，因此這些有讀書的學生應該會先被釋放。我猜想，自己應該會沒事吧。有一天，聽到看守叫：「張火山出來」，只有我一個人被釋放，叫我回家。經過三道鐵門之後，我姑姑在外面等著接我回家。我猜想應該是我家裡的人去「活動」，不然姑姑怎麼知道我何時被釋放。我姑姑見到我，說：「我已經站在這裡等了三、四個小時，熱得要死。」然後，她帶我去理頭髮、洗澡、吃豬腳、過爐火，再回家。其他的人後來怎麼樣，我並不知道，雖然在監獄裡面的時候，彼此曾經約定出來之後要互相聯絡。

臺灣省立工學院

二二八事件之後，我決定乖乖唸書。回到學校之後，已經錯過學校的期末考試，必須補考。我去找老師補考，老師問我：「張火山你怎麼了？」我告訴老師，自己因為二二八被關。結果補考考卷仍是原本的試卷，我向老師報告這份考卷我已經看過了，問題都會答，老師只好手寫另出一份考卷給我。考完之後，老師對我說：「張火山，假如你要唸書，就到廈門大學去，不用錢、公費，我幫你寫推薦信。」那位老師是外省人，德國留學回來的。我猜大概他知道我因為二二八事件被關，覺得我以後大概沒前途了，認為我還是去大陸比較好。但是我覺得臺灣的大學很好，沒必要到大陸去。那時候的臺灣省立工學院，不是德國留學回來的老師，就是廈門大學的老師，應該也還不錯。

白色恐怖時期，和我關在同一個房間的人，姓謝，他是廈門大學學生。他說他在廈門大學的同學是共產黨，但他自己並沒有參加，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逮捕。我們安慰他，應該不會有事。在牢裡的時候，他寫了報告書交了出

¹⁷ 嘉義縣朴子市舊名。

去。某天看守來叫他，這位姓謝的，以為終於要審問他了，所以很高興地出去，結果沒有再回來，被槍斃了。我一直到前幾年，看陳英泰的書，¹⁸才知道這位姓謝的被槍斃了。當時如果我也去讀廈門大學，回來說不定也會被懷疑。我同房有一位南一女教國文的老師，姓蔡，也是廈門大學畢業。所以這所廈門大學，應該是很有問題的一間學校吧。這位姓蔡的老師，出獄後去印刷公司上班，後來去到北一女中教書。

我覺得臺灣人的內心漸漸對現狀不滿，就算那時候不知道共產黨，也不了解蔣介石如何，政治意識很低，只是選舉的時候去看看熱鬧，但是，開始覺得不滿現況。我們經歷過日本時代，對於國民政府來了之後的無理、無秩序、有理講不清、只有你們贏、我們輸的狀態，產生對現實的不滿。我是唸科學的，看不起那些讀死書、風花雪月、學竹林七賢每天吟詩看月亮的人。我想，難道沒有辦法，讓這個社會更好？讓可憐的人改善生活？！

當時社會上可憐的人，不只臺灣人，也有外省人。我寄宿的地方在臺南放送局的前面，我們有十幾個同學住在一起，請一個歐巴桑來煮飯。有一天早上，聽到外面有人淒哭。原來，對街臺南放送局的防空洞，住了一群大陸來的難民，一家子爸爸、媽媽、小孩子都窩在那裡。當天他們聽到牆壁有迸裂的聲音，趕緊跑出來。媽媽想到還有一條毛巾掛著忘了拿，跑回去拿，結果一拉，沒想到整個防空洞就坍塌下來，媽媽因此被壓死。那時候也有很多外省人處境很淒慘，那些跟著來臺灣的軍人、老百姓，佔到房子的人就有地方住，沒佔到房子的人只好住防空洞。所以不只臺灣人很辛苦，一些跟著來臺灣的外省人也沒受到很好的安置。

在臺南的時候，我寄宿在同學家，房租除了繳現金，每個月還必須準備一袋米給房東，當時米很貴很難買。不過我在成大唸了一段時間後，有一位大陸來的老師勸我申請公費就學，我擔心申請公費畢業後必須要做公務員，這位老師直說沒關係、沒關係啦。我想，大陸來的老師應該比較知道世面吧，所以聽了他的話就去申請公費。公費生每個月可以領米單，領了米單再去米店換錢。這件事我沒讓家裡知道，變成是我的私房錢，而家裡另外再給我學費。所以我學生時代的生活算是優渥。

¹⁸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年3月）。

被捕

唐朝雲是我在高雄工業學校和臺灣省立工學院的同期同學。他以前在學校的時候並不怎麼耀眼，不太突出。當我們光復後組織學生聯盟、參加球隊的時候，唐朝雲安安靜靜的，不太出風頭。但是到了省立工學院，他當上級長，而且成績很好，大學時候數學還得到 98 分。大三的時候，我和他一起租房子住，有時候在住處難免會談論時局，談到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後來唐朝雲被抓走，當時我還很天真，找了其他同學，準備去他東港老家探望他父母，怕他父母擔心咧。

我被抓那一天是 1950 年的暑假，8 月 24 日早上，那時我唸大四。那天我和同學原本約好在高雄火車站集合，準備一起去東港。結果，我還沒出門，我母親在樓下叫：「火山、火山，有人找你。」一看，是一個長得很黝黑的刑事，是臺南的刑事，他說：「張火山，我找你好久了。」當時我家後門還站了一個人，樓梯前也站了一個人，總共三個人把我押去苓仔寮的派出所。刑事把我的手和他的手銬在一起，我問他：「你抓我幹嘛？」他說他也不知道。走到一半，他問我：「你有沒有參加共產黨？」我說：「我怎麼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他說：「如果參加的話，包死欸。」

刑事警察和我坐了公車來到高雄火車站，準備前往臺南。原本和我約在火車站準備去東港的同學，一看到我就喊：「張火山，我等你很久了……」我一直對他搖手，示意他不要再講。我離開家的時候，吩咐我媽媽趕快打電話通知我大哥，因為我曾經跟我大哥提起，和我住在一起的唐朝雲被抓走了。我那時候也稍微有些危機感。坐著火車，刑事帶我到臺南警察局，跟我約在火車站碰面的那位同學，知道我被抓之後，找他的女朋友送便當到警察局給我吃。他可能認為男生去警察局比較危險，女生應該比較安全，不會被抓。那時候我和唐朝雲寄宿的房東，是一個當消防隊員的臺灣人，這位房東知道消息後，也帶東西來警察局給我吃。我會記得他們，是因為當時大家一知道我們涉入「紅頭仔」的案子，也就是共諜案，大家都怕，沒人敢靠近。所以還會送便當給我的人，很有人情味。我在臺南警察局好像是住了幾個晚上。

和我同案的人，我只跟唐朝雲比較熟，雖然還有幾位成大學生，但不熟，其他人我就完全不認識。事後回想，唐朝雲是有一些私密沒讓我知道。平常唐朝雲都和我一起活動，一起騎腳踏車出去玩。有一天，一位同學的女朋友帶了

三個女學生來，大家約好一起出去玩，我就找唐朝雲一起去，但是當天唐朝雲卻難得表示不參加。後來在臺北軍法處的時候，唐朝雲才跟我說，那天他是去開會，因此不能和我們一起出去玩，其實當時他很想和我們一起去呢。我後來曾經寫一篇文章〈唐朝雲同學之死〉，寄給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的徵稿活動。¹⁹

保密局和軍法處

我關在臺南警察局幾個晚上之後，被叫出來，和十幾個人，我們的手銬在一起，由警察和憲兵押解，送往臺南火車站，再送到臺北橋頭附近的鐵工廠，就是辜顏碧霞的高砂鐵工廠，當時是保密局的北所。我被關在那裡一個多月。那時候很多人關在那裡，包括唐朝雲、施志聰、軒轅國權等，都是成大同學。施志聰本來判十年，後來因為逃獄事件再增判兩年。²⁰從臺南警察局和我一起被押往臺北的十幾個人，我一個都不認識，後來才知道有些人跟我一樣，是臺南市工委會的案子。

我到北所的時候，唐朝雲都已經先在那裡了。施志聰是在嘉義被捕的，他被關到腳都腫起來，所以找了阿兵哥來打針，牢房的看守看到了，對著打針的阿兵哥說：「他腳痛，你不打腳，為什麼打在手腕？」

關在北所沒審問，不過我的自白書好像是在北所寫的，寫了好幾次，交出去讓他們修改，一直說不行，還要修改。北所之後移送軍法處，我和唐朝雲、廈門大學畢業姓謝的，還有一些桃園案的人，以及在湖口基地涉及匪諜案的軍官，聽說是孫立人的部屬，關在一起。這幾個軍官一直說孫立人是無辜的等等。

軍法處關在一起的人，還有一位嚴姓律師。當時覺得關在一起的人，不少是有學問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大概佔三分之一。其他還有退役老兵、老百姓等等。在軍法處也有一些刺青的流氓大哥，如果一般人進來，得先拜他們為老大，但是我們不用，還可以坐在馬桶上面，接受他們敬拜。因為他們聽說我們是「紅頭仔」，是為了臺灣好才被抓進來的人。我以前曾寫過一篇文章，談及當時監獄的情形，

¹⁹ 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曾於 2011 年因應世界人權日主辦紀念活動，以「記憶與烙痕：獄中故事再現」為主題，辦理徵稿活動。

²⁰ 根據判決書，施志聰從原本 10 年徒刑改判 15 年。至於逃獄事件，詳下文。

不僅沒有霸凌，一些有知識的人，還會教導沒知識的人，藉此機會想當更好的臺灣人。其實當時監獄裡，大家蠻和氣的，如果外面有人送東西進來，如肉鬆、肉乾，認識的幾個難友也會一起吃。有時候寫寫文章，給那個律師修改，這樣度過獄中的日子。

逃獄事件

我一直沒有被叫出去審問，有時候久久才叫一個人出去審問，一間房大概有三十幾個人，關政治犯的房間約有三十幾間。1951年2月16日逃獄事件發生時，被打開的房間並沒幾間，我的房間也被打開。事情經過是這樣，那天早上，唐朝雲和謝傳祖坐在門邊下棋，後來他們告訴我，有人會來通知越獄，但是他們沒先讓我知道，因為他們相信我應該沒事，雖然會被判刑，但至少不會失去生命。唐朝雲知道自己應該會死，謝某則覺得他從廈門大學回來，他的同學又參加共產黨，他自己應該也會沒命，所以他們兩人坐在門邊下棋，是準備第一時間逃跑。首先衝出牢房的是跟我同案的何秀吉，他說學過柔道，是「黑帶」，有段的，他空手攻擊看守的「みぞおち」，就是腹部穴道，看守一直發出哀號，接著好幾間房門被打開，好幾個人跑出去，我的房門也被打開，但是唐朝雲和謝傳祖兩人看情形不對，沒有往外跑。因為外面情況不佳，又更外面的鐵門已經關上。後來唐朝雲跟我說，計畫是由兩個人拿著屎尿桶到樓下清理，看守的人站在旁邊，他們便發動攻擊，搶奪鑰匙，再打開牢房的門。逃出去的人也沒武器，什麼都沒有。當時要逃出牢房總共有三道鐵門，第一道門被突破之後，第二道門看守剛好要進來，他趕快把門鎖上，結果逃出去的人只好乖乖回來。計畫失敗之後，就一個一個被叫出去問。這些事情是後來我去綠島遇到施志聰，聽他說的。

某天早上，我們聽到外面有人哀哭的聲音，也有吼叫聲，我們便爬上去從牢柵間窺看，看到幾個身體很強壯的男子，被五、六個獄卒攙扶著，腿軟到無法走路。原先我們以為是將被拖出去槍斃的人，結果後來聽雜役說，是臺北的流氓頭子，準備送往金門，讓他們挖兩年戰壕，之後才會無罪釋放他們。結果這些流氓老大聽到將被送往金門前線就腿軟。其實當時關在軍法處的流氓，如果和獄方談妥，往往搖身一變成為線民。國防部軍法處的政策是一邊管訓流氓，一邊吸收他們當線民，刑事和線民綁在一起。

唐朝雲之死

在軍法處，平常吃早飯的時間約是六點左右，如果是六點聽到喀啦喀啦的聲音，就是送飯的雜役來了。但如果是五點左右，聽到喀啦喀啦的聲音，便是「白頭翁」來了。憲兵帶白帽子，所以我們稱憲兵為「白頭翁」。唐朝雲被槍斃那天，早上五點多，「白頭翁」來了。而在幾天前，唐朝雲被叫出去問，然後又回來。之後，唐朝雲每天早上都會換上乾淨的衣服，那是家裡帶來的衣服，他自己大概知道差不多就是這幾天吧。那天憲兵來到門口，叫：「唐朝雲出來」，唐朝雲聽到之後臉色變青，但是一個一個和我們握手，說：「拜託、拜託，以後是你們的事了。」很慎重地和大家握完手之後，走出去。看守想要攙扶他，他說：「不用，我自己走」，揮開看守的手，出去馬上被銬上腳鐐，然後聽到腳鐐「哐哐哐」的聲音。這時不知道從哪間牢房開始有人唱起歌，我們便一起唱起歌，算是送別。

在獄中的時候，如果有人被叫出去槍斃，我們都會唱「幌馬車之歌」，²¹有時候會唱：「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們流的血照亮的路，我們會再向前走。」這大概是共產黨的歌。那天唐朝雲走出去之後，先關在獨身房一晚，聽說那間獨身房的整面牆壁上寫了一些詩，有些還是用血寫的。我想強調的是這些年輕人很勇敢，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又沒做壞事，應該要勇往邁進。那時候，只是單純想這個政府為什麼這麼鴨霸，有理說不清，我們如果能夠改善這個環境多好。

我和唐朝雲住在一起的時候，雖然會說一些對時局不滿的事，但是不會談論太多政治，因為那時候政治意識並沒有這麼強烈。列寧說過：進大學二年，入獄兩年，年輕人才算是成人。老實說，我們的政治意識應該是在監獄裡面才被加強。唐朝雲被抓走的時候是冬天，他家裡都不知道他已經被槍斃，他哥哥當時讀臺大商學院，在火車站的告示版上看到自己弟弟被槍斃的消息，才跑去告訴大哥。

²¹ 「幌馬車之歌」的歌詞為：「夕べに遠くホの葉散る／並ホの道走幌 上／君加幌馬車見送く／遙辦彼方に消たて行く／思ム出多き丘の上で／遙けき國の空眺め／夢上消玉水を一歳の／心なきくに涙拂人／轍ちの音き懐レく／並ホの道在幌 上／君が幌馬車見送クレ／去年の別水が永久そ」。藍博洲，〈幌馬車之歌（上）〉，《人間》，第35期（1988年9月1日），頁157。

唐朝雲的大哥到監獄要領回遺物，我聽說他大哥和監獄的人吵架，因為發現唐朝雲的遺物太少，缺了很多東西，他大哥很不甘心。朝雲的弟弟後來告訴我，哥哥們怕太驚嚇盼望著孩子回家的父母，二哥先進門慢慢告訴老人家事情的始末，然後大哥才抱著朝雲的骨灰進門。

綠島

我在 1951 年被送到綠島，是第二批送綠島的人，我和陳英泰他們同一批。從軍法處被送到基隆，我們在基隆坐船，當時是夏天。坐那種可以搭載上百人的登陸艇，關在船艙下面，一堆人吐得要死，本來不會吐的人，看到這種情形，也變得想吐，而且兩個人銬在一起，如果想上廁所，也得兩個人一起去船艙上面。我沒有吐，但是第一次體驗到暈船的經驗，和感冒差不多，也不是頭痛，但就非常不舒服。我們從基隆先到臺東，大概坐了一日。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被判刑幾年，聽到的都是風聲。

我們抵達綠島的時候，有些當地女人沒有穿上衣。後來聽說里長的女兒，長得很漂亮、人很好，結婚的時候穿著的新娘嫁衣，竟是臺灣一般女孩子穿的內衣，這是當時綠島的情形。我們被宣稱是壞人，不能接觸綠島當地居民，但是我們必須到外面買菜，所以阿兵哥通常帶著兩個政治犯去採買。因為採買的關係，多少都會和島上的人接觸、講話。島上的人開始漸漸覺得這些政治犯很斯文，和流氓不太一樣，但是又很害怕，也不敢多交談。有時候去山上砍草的時候，碰到島上一些女孩子，多少會聊上一兩句，她們也覺得我們這些人不太一樣。

新生訓導處沒有醫療設備，只有一些紅藥水、碘酒、雙氧水，其他一些需要的醫療用品，都是難友中的醫生們自己要家裡寄過來，自然而然形成一個醫療團，島民有人生產遇到困難，跑來新生訓導處，向處長求助，所以就讓政治犯中的醫生，協助島民生產。接生成功之後，島民當然很感謝這些醫生。島民知道這些政治犯中有醫生，也有大學畢業的人，漸漸覺得這些人應該不是壞人，而且政治犯對於島民文化的提昇也有幫助。我們剛到島上的時候，島上只有牛車，等到我們即將離開的時候，島上已經有三輪摩托車。當時我們要吃的米，必須到港口靠我們自己用人力扛回來，蓋房子所需的木料也必須自己砍，最諷刺的是去海邊掘砵咕石，蓋「萬里長城」，即集中營的圍牆，自己做牆圍自己。因有這些經驗，使

得現在如果要我拿鋤頭、十字鎬，都沒有問題。現在幫我按摩的人都說：「張先生，你也不是務農的人，但你的肩膀怎麼這麼硬」，我都說因為我以前命比較不好，做過苦工，不敢說因為以前在綠島挑東西導致。

我是綠島第一批回臺北監獄的人，在綠島只待了一年多。後來我聽陳英泰說，那一批被送回臺灣的人，約一百多人，本來是準備槍斃的，但是找不到理由。正在想捏造槍斃的理由時，剛好綠島發生案件，像是吳聲達他們，還有一些退役軍人、報社編輯，他們的讀書會案件被查到。結果其中一些人，好像是高木榮他們，被吊起來刑求，受不了逃走，跳海自殺未遂，被抓回來打得更慘。²²其實，讀書會也是因為當時大家很有進修的精神，島上教育一天到晚只讀三民主義、領袖言錄。

我被送回來臺北軍法處看守所，再送到安坑軍人監獄。我在軍人監獄度過最後的刑期，大概兩三年。聽說綠島發生的案件，是因為當時處長姚盛齋發起「一人一信運動」，叫政治犯在身上刺字，但沒有難友願意配合，官方覺得漏氣，才想盡辦法抓所謂讀書會，利用讀書會的名義，槍斃了十幾個人。這樣的事情，第一批送回臺灣的人，就沒遇上，真是撿到一條命。我們第一批被送回來的人，有一些人跟我一樣，刑期只有五年，但是都被認為是比較不聽話、難管教的人。

出獄

我離開安坑監獄的時候，沒有褲皮帶，只好用一條繩子綁著褲子，穿著我家裡送來的運動褲、夾克。當時已經下午四、五點，天色也快暗了，我走路離開安坑，大概走到南勢角一帶吧，迷路了，只好向路邊的歐巴桑問路，歐巴桑說：「今天才出來喔……」然後對一旁的人說：「快點跟他說怎麼走」。我一路走到新店，準備搭巴士。在巴士上，巧遇到一位工學院同期同學，他是第一屆傑出建築師之一，他說：「今晚來住我家。」當時我想天色已晚，要搭火車也沒什麼自信，也

²² 1953年2月，綠島曾把約一百多名所謂「頑劣份子」送回新店軍人監獄。之後，綠島新生訓導處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要求政治犯響應並在胳膊上刺上「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等標語，未料多數政治犯反對響應，當局遂採取報復措施，把十幾個人送回臺北軍法處判處死刑，其中包括吳聲達，以及陳行中等人。之後，新生訓導處開始抄房，發現郭聰輝等人書寫的「問題文件」，又將一批人處死。見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年3月），上冊，頁380-387；龍紹瑞，《綠島同學老檔案》（臺北：人間出版社，2013年），頁221-223。

不知道火車站怎麼去，所以當晚就住在他家。我高雄家裡的人已經接到通知，在我離開軍人監獄的隔天早上，我叔叔、大哥、二哥、妹妹一群人，一直在高雄火車站等我，結果苦等不到人。我那時還年輕，天真地想以後可能也沒什麼機會來臺北，應該把握機會多看看臺北，所以才選擇在同學家留宿一晚。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抵達高雄，家人已經沒有繼續等候了，我就自己走路回家。

我在牢裡進修了國語、英語，讀了一點書，也還算努力用功，連裡面的人聽我在教人家國語發音，他一度以為我是北京來的，國語講得很好。不僅如此，還鍛鍊身體，每天放風的²³時候，在草地上走走路，吃飽飯後，大家又在牢房裡繞圈走路，一間房間沒幾坪，關三十幾個人，大家排隊走，很有秩序，照規矩來，沒什麼霸凌事件，不過偶而會發生毆打「爪耙仔」的事。當時打小報告的人，被打之後，又跑去打小報告，使得打他的人被叫出去，手腳往背後綑綁，再吊起來，在監獄內由雜役扛著，上下搖晃，繞圈行走示眾，或是戴著手銬、腳鐐，拖著走，腳踝都滲出血來。

為了鍛鍊身體，每天做伏地挺身，我只能做五十下，便滿身大汗，有人三十分鐘內做到一百下。為什麼要鍛鍊身體，因為我們想著：「有一天，一定要和你拼」，因為都被判十幾年嘛。有一天，一定是我們臺灣人受不了惡政，自己起來反抗、解放。臺灣人自己起來解放也好，共產黨來解放也好，那一天真的來臨，我們被關著的人總是要和看守監獄的人拼，所以為了要和他們拼，身體不鍛鍊不行。當時偷偷鍛鍊身體，有些人鍛鍊到還可以雙手握著牢桿，九十度水平撐起身體。不好好鍛鍊身體的話，改天如果我們臺灣人起義，看守一定會先打死我們。我們想著，為了以後的起義，預做準備。另外，鍛鍊身體也為另一件事作準備，因為以後出獄可能沒工作，我自己可能必須去苓雅寮的港邊當苦力。大家都知道，出獄後沒人敢收留我們，因此必須想辦法鍛鍊身體，耐得起做苦工。

工作

等到我真的離開監獄，確實找不到工作，因為知道的人，都沒人敢聘請我。恰巧知道當時臺灣水泥公司要招考人員，陳田錨好像在那裡當處長什麼

²³ 「放風」，指到牢外草地上散步十分鐘。

的，是不是透過他的關係我得到消息，我已經忘記了。陳田錨是我的同班同學，公學校的時候和我坐在一起。他很調皮，拿他爸爸從日本買回來的一把鋒利刀子，上課中在書桌下揮著玩，結果不小心割傷自己。他小時候書也讀得不錯，他有補習，但考到哪個學校去，後來的情形，我就知道了。總之，我去報考水泥公司，結果考取了，用的是高雄工業學校畢業的學歷，不敢用省立工學院的學歷，因為人家只需要請工人。

我在水泥公司工作，煙囪裡面會沾附水泥粉，煙囪燃燒的時候，這些水泥粉會被排放出去，被市民罵，所以必須清除這些水泥粉。我帶著眼鏡、矇著面巾，把全身防護住，熱得要死，也得繼續清理這些水泥粉。有一次這樣連續二週加班，因為水泥粉的關係吧，導致眼睛整個紅腫，不敢回到苓雅寮，只好跑去哥哥那裡，他家在水泥公司附近。我大嫂看到我這個情形，覺得很不捨。還有一次，裡面的高壓線，好幾萬伏特，因為要利用高壓線吸住那些灰塵，我們必須去敲那些高壓線，讓灰塵掉落。高壓線有兩邊，清理的時候必須關掉一邊高壓線，另一邊保持繼續送電，好幾排的高壓線，輪流清理。我不小心敲錯，敲到通電中的高壓線這邊，被幾萬伏特的高壓電電到。為什麼我沒死？因為腳底站著的地方，使用陶器碍子絕緣，因此沒有全身觸電，只有手覺得一陣酸痛而已。好在班長從背後叩我肩膀，提醒我敲錯了。

從監獄出來的人，我算是運氣比較好，有工作還有月薪可以領，而且當時水泥公司有賺很多錢。有一天事務所的女職員跑來：「張先生，把印章給我。」我說：「為什麼？」她說：「領錢啊！」水泥公司當時賺錢有盈餘，除了薪水之外，還發放福利金。我認為水泥公司大概不知道我被關的經歷，如果陳田錨不說的話，應該沒人知道。和其他人比較起來，我算是好命，其他綠島回來的人都沒工作，很可憐。後來也有一些難友，因為生活艱苦來向我借錢。

我前面提過我自認為以後不會有機會來臺北，所以才選擇在同學家借宿一晚。我有個同學當時在唐榮鐵工廠擔任臺北採購主任，很有勢力。他跟我說如果想謀求發展，應該要到臺北，加上成大時期的老師又到臺北開設新公司，公司剛創立，廠長是讀成大機械系的學長，他讀機械，缺一個唸電機的，因此找我來臺北工作。

我一到臺北，警察就來找我，反倒是在高雄苓雅寮的時候，警察沒有來找我。雖然規定回到高雄的時候，必須向苓雅寮的警察報到，但是報到我也沒去，大概是家裡的關係，警察才沒來找我。我一到臺北，管區便來找我。管區

第一次來我家的時候，我比較聰明，跟他說：「按照規定，你不能來我家，只能叫我去派出所。你不能來我家，如果有什麼事情就來工廠找我，你有上司叫你這樣做，我也有上面可以報告，按照規定你們不可以騷擾這些回來的政治犯。」事實上，確實有不准騷擾這些政治犯的規定，但實際上大家都受到騷擾。我這樣對那位管區說之後，這個來找我的管區可能嫌麻煩，便把監督我的責任推給工廠的管區，後來就變成工廠的管區來找我。工廠的管區警察本來就可以來查訪工廠，不過我和這位管區關係建立得很好，因為我是負責幫工廠送紅包的人，所以我很少被騷擾。

但是，不甘心的是不能出國。那時候，日本的公司，如三菱、東芝等都有預算，由日方出錢讓臺灣的員工到日本見學三個月，臺灣入選十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結果，其他九個人都順利出國，唯獨我不能出去。出獄好多年後，我去找以前新生訓導處的處長唐湯銘當我的保證人，我才能出國。唐湯銘跟我說，他退休之後，他跟上司商量另外成立一個組織，來安置從綠島回來的政治犯。因為如果不好好安置這些人，這些人可能會影響社會動盪。不過，我以前在綠島時候，跟唐湯銘不熟。我去找他的時候，我在社會上已經有一些地位，而且經常受邀到處演講，我跟唐湯銘說：「我這樣好好一個機會，如果不能出國，我會怨嘆。而且我也累積了一些社會名聲，如果我不滿，新聞記者也會時常來找我。」結果他說：「好，我幫你作保。」因為這樣我才得以出國。我第一次出國的時候，大概是民國六十幾年的事。

我當過兩個上市公司的總經理和董事長，當時是李國鼎當經濟部長，很感謝他當時對少有經濟情報的我們民間企業界做了正確的輔導，有時一起商談。趙耀東和我見面時，都喊我：「火山兄，火山兄。」他是前輩，我實在不敢當。後來我離開公司，其實也是公司派我去和一個美國回來的學者，一起創辦另一間通訊公司。和其他政治受難者比起來，我算是運氣非常好的，大概是我祖上、父母有積德吧。我媽媽曾獲選為高雄市模範母親，我大哥是模範父親，我妹妹是高雄孝女。我做了兩個上市公司的總經理和董事長，大概七十二歲的時候，我完全從職場退休。成大曾經選我為傑出校友，²⁴是學校社會對我的肯定吧，算做自我安慰了。

²⁴ 參閱自「成大 75 周年校慶 嚴選 75 位對國家經建有功之校友表揚」，<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6-1054-46768.php>，引用日期：2014 年 9 月 11 日。